认知战难民与结构性传导：AI 时代中国认知主体性的困境及其工夫论回应

李岳锋[1]

（北京中人国际心理医学研究院　北京 100054）

摘要

本文提出“认知战难民状态”这一分析概念，指范畴外源、内化不可见、激励中介、抵抗无坐标的四维认知困境——它区别于自媒体概念“高认知难民”（指知识无法转化为生存能力的人），也区别于 Rabet（2025）的“epistemic refugee”（指因自我叙事受威胁而回避知识的人）。本文研究 AI 时代信息生态与认知域竞争双重压力下，当代中国认知主体性形成条件的结构性重塑。以“道术为天下裂”为文明史总纲，以“结构性机会”模型为分析框架，以中华工夫论为规范性资源，本文以概念建构为主导方法论，提出并辩护四个分析概念。“认知战难民状态”描述上述四维困境；“结构性传导”描述四种传导位置（教育者、平台、学术中介、日常话语参与者）如何通过激励兼容系统性维持认知裂隙，其心性论命名为“心为物役”（利益遮蔽、信息过载、从众压力三重壅塞）；“结构性背叛”描述不要求主观故意、不指向可点名个人、不预设清晰边界的背叛形态，其判准为功能判准（是否扩展共同体自我理解能力）、道统判准（是否参与道的追问与传承）与良知内在判准（只有自己能检验的良知是否被遮蔽）的三重结构；“自作主宰”描述以知止、省察、求放心、事上磨练、养浩然之气五条工夫为核心的认知自主框架。本文不主张经验因果，只主张概念框架的解释力与可检验性。

关键词：认知战难民；结构性传导；心为物役；结构性背叛；道统；自作主宰；概念建构

---

[1]**作者简介**：李岳锋，北京中人国际心理医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东方心育学建构、传统文化，学生心理健康与人格成长。E-mail:10909173@qq.com

一、引言

1.1 问题提出

认知战研究面临一个核心悖论：其成功的标志，恰恰是被作用者确信自己未被作用。 假新闻可以被辟谣，但如果一个人用来判断“什么是真”的范畴框架本身是被供给的，他连辟谣的根据都没有。这意味着认知战的操作层面不在“信息流”，而在“解释权”——不是让你信错一件事，是让你用什么去信被安排。

这一判断将认知困境的形态从“信息不足”转移到了“解释框架被供给”。信息不足可以通过获取更多信息来解决；解释框架被供给，却无法通过信息量的增加来克服——因为框架本身决定了什么算信息、什么算噪音、什么算相关、什么算无关。

本文的总研究问题是：在 AI 时代的信息生态与认知域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当代中国认知主体性的形成条件如何被结构性重塑？中华文明的工夫论传统能否为此提供可被学术检验的理论资源？

1.2 研究问题与核心命题

甲类·可经验检验的命题（EP）：

EP1：第二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4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 108.76 分钟，数字化阅读接触率 80.6%[1]。此为背景性经验事实，不直接支撑某一理论命题，但为“注意力被结构性配置”的判断提供背景。

EP2：认知框架一旦形成倾向于自我确证——SPOT 效应表明，人们即使只是名义上“拥有”某个理论，也会自发地偏好该理论并认为其为真[2]。此为实验室证据，推广到社会层面须显白说明限度：实验条件与真实信息生态之间存在差异，推广时须谨慎。

EP3：中国高校文献计量评价产生“绩效悖论”与非预期后果——基于 15

位中国学者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发现，文献计量评价破坏学术自主性、削弱自我效能、侵蚀创新动机、触发机会主义行为[3]。样本 15 人，代表性有限，结论应被理解为“存在这种现象”而非“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

乙类·理论框架内的分析命题（TP）：

TP1：认知战的目标从“控制信息流”转向“争夺解释现实的权力”[4][5]。此命题在认知安全研究框架内为真，与信息战框架可争论。

TP2：算法推荐系统的优化目标与认知多样性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此命题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内为真；经验证据存在分歧——Nielsen（2022）的综述表明“信息茧房假说未获支持、回音室现象存在但比通常假设的更不普遍”[6]。本文使用此命题时取其较弱版本：算法优化与认知多样性之间存在张力，但不主张“算法必然导致认知封闭”。

TP3：认知裂隙通过四种“传导位置”被系统性维持。此命题在结构社会学框架内为真。四种位置的选择标准是“在认知范畴社会化的四个功能环节中占据不同位置、且其激励结构可被显白描述”——教育者（供给环节）、平台（分配环节）、学术中介（合法化环节）、日常话语参与者（再生产环节）。这一划分不是穷尽的，但是可操作的。

TP4：课堂的时间优先性来自认知框架形成的不对称性。此命题在认知哲学框架内为真，不依赖特定发展心理学理论，只依赖“认知框架倾向于自我确证”这一一般认识论事实。

TP5：“结构性背叛”的功能判准可与心性判准并置。此命题在政治哲学框架内为真，须与 Young 的“结构性不义”[7]对话——两者共享“不要求主观故意”的立场，但本文增加了“良知内在判准”这一心性论维度。

TP6：“自作主宰”不等于“拒绝外来”。此命题在比较哲学框架内为真，与“文化纯粹主义”可争论。中华文明的主宰能力恰恰体现在消化外来范畴的能力上[8]。

丙类·规范性的哲学命题（NP）：

NP1：认知难民状态是一种需要被命名的认知困境。此命题在 EP/TP 论证后出现。

NP2：教育的本质是“养其知是知非之良知”。此命题在 EP/TP 论证后出现。

NP3：忠诚的最终对象是道统（追问的条件），而非任何一套固定答案。此命题在 EP/TP 论证后出现。

NP4：工夫是认知自主恢复的必要条件（弱必要——限定了工夫的可能空间，但不决定工夫的具体形态），物质条件是必要但非充分条件。此命题在 EP/TP 论证后出现。

1.3 方法论定位

本文的主导方法论是概念建构（conceptual construction） ——引入、修正、辩护三个分析概念：认知难民状态、结构性传导、结构性背叛。比较哲学为概念建构提供中华文明的范畴资源（道术为天下裂、心为物役、蒙以养正、道统、自作主宰）；案例为概念提供可辨识的示例（非经验证明）；批判理论为概念建构提供规范指向（为何这些概念值得被引入）。

概念建构的操作分三步：引入——从现象描述中提炼概念；修正——与既有概念对话，说明增量；辩护——回应可能的反驳（“这是阴谋论”“这是受害者主义”“这是文化本质主义”）。

本文不主张经验因果，只主张概念框架的解释力与可检验性。 每个核心概念在第八章接受“概念工具”的自我检验：后续研究者会怎么用它？它能不能被用错？如果用错了，怎么发现？

1.4 论文结构

第二章综述文献并定位核心概念的学术增量。第三章建立认知战的分析框架（解释权争夺、结构性机会、认知难民四维）。第四章分析传导机制与心性论（结构性传导、四种位置、心为物役）。第五章论证课堂作为关键场域（时间不对称

性、供给追问终点、蒙以养正）。第六章重建背叛与忠诚的概念（结构性背叛、三重判准、道统之辨）。第七章建构自作主宰的工夫论框架。第八章讨论理论贡献、概念工具检验与研究限度。

二、文献综述与核心概念的学术定位

2.1 认知安全研究的谱系

认知战作为独立作战域的战略承认，可见于多国战略体系。中文军事理论界以“制脑权”概念把握认知域作战的目标[4]；北约创新中心受盟军转型司令部资助完成的认知战路线图（2020）将“人类心智”确定为第六作战域，但该报告明确声明其观点“不反映 ACT 或其成员国的官方立场”[5]。本文推进的是“解释权”维度，而非仅“信息流”维度。

2.2 去殖民性理论与文化殖民主义批判

去殖民性理论揭示了“殖民无意识”的运作机制——外源范畴不以“外部观点”出现，而沉淀为感知的语法[8]。Rabet（2025）提出“epistemic refugee”概念，指因自我叙事受威胁而回避知识的人[9]。本文借用“殖民无意识”的分析，但以“道术为天下裂”替代“殖民”作为总纲。“殖民”预设了一个外面的敌人，“裂”则把问题定位在内部的裂隙上——认知战利用的是你自己家里的裂缝，而非从外面砍一刀。

2.3 结构社会学的“无人负责的系统性后果”传统

Weber 的“铁笼”、Bourdieu 的“惯习”、Giddens 的“结构化理论”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系统性后果可以在没有主体策划的情况下被生产出来。Muller（2019）系统梳理了“指标暴政”在医疗、教育、警务等领域的负面效应[12]；Strathern（1997）记录了绩效指标如何“转变制度”[13]；Campbell（1979）提出了“指标一旦成为目标就会被扭曲”的定律[14]。本文借用这些分析，但增加心性论维度——“心为物役”不是“异化”的中国翻译，而是把问题定位在主宰

能力的持续养护上。

2.4 政治哲学中的“结构性不义”

Young 提出“结构性不义”概念：不义可以存在于社会结构中，而不要求任何个人的主观故意；对应的责任模型是“社会连接责任”——不是追究个人罪责，而是要求所有参与结构的人共同承担改变结构的责任[7]。本文的“结构性背叛”与 Young 共享“不要求主观故意”的立场，但增加了“良知内在判准”——最终裁决权在每个人的良知里，别人可以指出你行为的后果，但“你是不是在背叛”最终只有你自己能在心上回答。

2.5 中华工夫论传统

孟子讲“心之官则思”“求其放心”[15]，朱熹讲“省察克治”[16]，王阳明讲“知是知非”“事上磨练”[17]，孟子讲“养浩然之气”[15]——这些构成了一条从“停”到“看”到“收”到“练”到“养”的工夫链条。本文首次将这些工夫系统地重构为 AI 时代认知自主的可执行框架。

2.6 核心概念的学术定位

“认知难民状态”vs “epistemic refugee”（Rabet, 2025）vs “殖民无意识”（Fanon）vs “符号暴力”（Bourdieu）：增量在于“四维操作化”——范畴外源、内化不可见、激励中介、抵抗无坐标，使“殖民无意识”从修辞概念变为可分析的理论概念。Rabet 的“epistemic refugee”指向“因自我防御而拒绝知识的人”，本文的“认知难民”指向“在信息环境中失去认知自主性的人”——前者是主动回避，后者是被结构性塑造。

“结构性传导”vs Goodhart/Campbell 定律 vs Muller“指标暴政”vs Strathern“审计文化”：增量在于“传导位置”的类型学（四种位置）与“心性论命名”（心为物役），使“指标非预期后果”从描述性命题变为可定位、可归因的分析框架。

“结构性背叛”vs Benda“知识人的背叛”vs Said“知识分子的流亡”vs Young“结构性不义”：增量在于“三重判准”的结构化（功能、道统、良知内在），使“无主观故意的结构性后果”从描述性概念变为可操作的规范性判断框架。Benda 和 Said 预设了“有意识选择”[18][19]；Young 不要求主观故意但停留在公共责任层面[7]；本文增加了良知内在判准——这是一个只有自己能检验、但可以被反身性追问的维度。

“自作主宰”vs “cognition autonomy”vs “epistemic agency”：增量在于“工夫论框架”——五条可执行的、有中华文明根系的心性技术，使“认知自主”从规范性理想变为可实践的工夫链条。

自我检验标准：如果去掉上述“增量”，概念是否还有存在必要？——认知难民状态去掉四维操作化，退化为“殖民无意识”的修辞重复；结构性传导去掉类型学与心性论，退化为“指标有非预期后果”的老生常谈；结构性背叛去掉三重判准，退化为 Benda 式的道德指控或 Young 式的公共责任分析；自作主宰去掉工夫论框架，退化为“要有判断力”的空洞建议。四个概念的增量是真实的，但它们的理论价值取决于操作化定义能否被后续研究使用、用错、发现用错。

2.7 文献缺口与本文定位

认知安全研究缺乏文明史尺度的认知困境理论；去殖民性理论缺乏对 AI 时代认知生态的分析；结构社会学缺乏心性维度；政治哲学的“结构性不义”缺乏良知内在判准；工夫论缺乏对现代制度结构的分析。本文填补此五重缺口。

三、认知战的分析框架：解释权争夺、结构性机会与认知难民状态

3.1 认知战作为解释权争夺

多数人理解的认知战是造谣——让你信错一件事。造谣是信息层面的操作，可以被辟谣。但认知战的操作层面更深：它不改变你信什么，它改变你用什么去信。　假新闻可以被辟谣，但如果判断“什么是真”的尺子本身是被供给的，你

连辟谣的根据都没有。

信息战是往水里下毒，你喝了会病，你知道是水的问题。认知战是换掉味觉——你喝了有毒的水，觉得甘甜；你喝了干净的水，觉得寡淡。味觉不会告诉你“我被换了”。

认知战与信息战、心理战、话语权斗争的区别在于：信息战的目标是控制数据流，心理战的目标是操纵情绪，话语权斗争的目标是争夺发声渠道，认知战的目标是争夺解释现实的范畴框架——不是“你信什么”，是“你用什么范畴去信”[4][5]。

3.2 “道术为天下裂”的三层分析

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20]，指的是知识整全性的碎裂——百家各执一偏，道术碎成互不相通的碎片。杨国荣指出，庄子批评的是“以一偏之见分裂统一之道”，其深层指向是“百家由分而合”[21]。本文借用这个命题，但不是要回到某个“未裂”的黄金时代——裂就是存在本身的历史形态；问题不是“回到未裂”，而是在裂中是否还有“合”的工夫。

“道术为天下裂”可以在三层上分析。L1 文明史层：知识整全性的碎裂，是轴心时代以来文明史的长期趋势。L2 现代性层：技术理性与学科分化加速了碎裂，民族国家体系将碎裂固化为“文化边界”。L3 当代层：AI 与算法使碎裂商品化、个性化、不可逆化。认知战是 L3 的战术形态，非根源。

3.3 “结构性机会”模型

认知战为什么能生效？不是因为敌人万能，是因为接收端有裂缝。认知战的效力 = 外部作用 × 内部裂隙。 没有裂缝，外部作用再大也进不来；有裂缝，外部作用只需要轻轻一推[10][11]。

Bourdieu 的“惯习”概念强调实践逻辑的生成性——惯习作为“结构化的结构”与“结构化的结构”，在实践空间中生成策略，而不必经过自觉计算[10]。Giddens 的“结构化理论”则强调结构的二重性——结构既是行动的中介，又是

行动的结果，社会实践在时空中的递归性展开中同时再生产结构[11]。两者的分工在于：Bourdieu 侧重“惯习”作为实践生成机制的内在逻辑，Giddens 侧重“结构化”作为结构再生产的动态过程。

五种内部裂隙：意义感空洞（忙完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社会信任耗损（对公共机构与专家系统的信任感被磨损）、教育评价主义（什么都被打分）、注意力商品化（注意力被卖了很多年）、文化断层（读不懂自家的经典）。这五条裂缝没有一条是认知战制造的。它们各有各的内部根源。认知战做的事，是放大它们、利用它们、把它们串起来。

此模型的功能是双重的：防止阴谋论化（不是敌人单方面制造了一切），防止受害者主义（接收端不是纯被动容器）。

3.4 “认知难民状态”的四维操作化定义

D1 **范畴外源性**：组织经验的基本二元对立（传统/现代、集体/个人、信仰/理性）及其价值排序，是在一个外部主导的话语生产体系中形成的。当一组对立被当作“不言自明”的常识来使用时，它已经在替你思考了。

D2 **内化不可见性**：外源范畴不以“外部观点”的形式出现，它已经沉淀为感知的语法。一个人不觉得他在“用西方范畴思考”，他觉得他在“客观地思考”。殖民无意识之所以是“无意识”，在于它不给你反思它的理由。

D3 **激励中介**：难民状态通过激励结构被维持——算法提供认知舒适区，消费提供身份符号，学术体制提供方法论奖励，教育竞争提供“有用知识”的筛选。你不需要被强迫，你自愿。而“自愿”恰恰是这套系统最精妙的地方。

D4 **抵抗无坐标性**：当你试图抵抗的时候，你用来抵抗的工具本身可能已经被捕获了。用“个人权利”抵抗集体压迫，可能落入另一套个体主义本体论；用“传统”抵抗现代性，可能把传统本质化为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纯粹过去。抵抗的第一步，必须是检验你用来抵抗的工具本身。

3.5 方法论说明：概念建构的三个步骤

概念建构不是“随便造词”。它有三个步骤。引入：从现象描述中提炼概念——D1 到 D4 不是先验的框架，是从“说不清的瞬间”中提炼出来的可辨识特征。修正：与既有概念对话，说明增量——第二章 2.6 节已完成。辩护：回应可能的反驳——“这是阴谋论”（回应：结构性机会模型明确拒绝单一外部主体论，认知战效力依赖内部裂隙）、“这是受害者主义”（回应：四维定义中 D3 明确说明难民状态通过激励结构被维持，接收端在某种程度上是共谋的）、“这是文化本质主义”（回应：本文不主张任何“纯粹传统”的存在，传统是活的、可争论的脉络）。

四、结构性传导与心为物役：谁在维持尺子的供给

4.1 从“换尺子”到“谁在维持”

第三章的框架是静态的——它回答了“认知战是什么”，但没有回答“谁在动态维持范畴的再生产”。本章提出“结构性传导”概念：当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他的理性选择会系统性地再生产某种认知后果，而他自己对此毫无察觉，他就处在一个“传导位置”上。

这个定义有三个关键点。第一，它不要求主观故意——善意的人也可能在这个位置上。第二，它指向的是位置，不是人——同一个好人，换一个位置，可能就不再传导。第三，它包括分析者自己——本文作者也在学术生产链条中，本文的写作本身是否也在执行某种结构性传导？

与 Goodhart/Campbell 定律、Muller（2019）、Strathern（1997）的对话：这些研究记录了“指标产生非预期后果”的事实[12][13][14]，本文的增量在于把“非预期后果”定位到具体的传导位置——不是泛泛地说“系统有问题”，而是说“在这个位置上，理性选择会产生这个后果”。这把结构分析从描述推进到了可定位、可归因的层面。

4.2 四种传导位置的类型学

四种位置的选择标准是“在认知范畴社会化的四个功能环节中占据不同位

置、且其激励结构可被显白描述”。四个功能环节的选择标准是“覆盖认知范畴从生产到内化的主要环节”——供给（教育者）、分配（平台）、合法化（学术中介）、日常再生产（日常话语参与者）。内容生产者可被归入“供给”或“分配”环节，家庭可被归入“日常再生产”环节。这个划分不是穷尽的，但覆盖了范畴社会化的主要功能。这个划分不是穷尽的，但是可操作的。

教育者（供给环节）：一个老师，面对五十个学生、二十周、统考、家长、检查。“把课上完、把分提上去”是理性选择，“留出时间让学生自己追问”是非理性选择。不是老师不知道追问重要，是系统的奖励结构让“关心学生”被编码成“帮学生在这个系统里赢”。淘汰不一定是暴力的，很多时候是温水煮青蛙式的：你不这样做，你就显得“不专业”“不负责”“不合群”。

平台/算法设计者（分配环节）：一个工程师，KPI 是停留时长、日活、点击率。“让用户多停留一会儿”是理性选择，“让用户看到他不爱看但需要看的东西”是非理性选择。这是一个闭环：你要想改变系统，你得先在这个系统里活下来；你要想活下来，你得先按系统的逻辑做事。不追指标的工程师在系统里待不久。

学术中介（合法化环节）：一个学者，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要“与国际接轨”。评价体系把“国际发表”编码成了“好学术”的默认标准。Jin & Jiang（2024）的质性研究记录了这种评价如何产生“绩效悖论”[3]。但这里必须有一个严格的区分：用外来理论不等于背叛。　严复译西学、宋明理学消化佛教，都不是背叛。判断标准不是来源，是功能——这个理论在你的手里，是扩展了中国人理解自己的能力，还是用“普遍性”的名义取消了这种理解的条件？学者这样做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想排斥，是因为评价体系让他看不见“排斥”这件事。

日常话语参与者（再生产环节）：一个普通人，在饭桌上、微信群里、评论区里，用外来的尺子评判自家的经验，并从中获得“我很清醒”的自我形象。他用的那把尺子让他感觉良好——他觉得自己在“独立思考”，其实他在用一套被供给的范畴来思考。社交淘汰不疼，但它有效：在饭桌上说“这个问题得从中国的道统里找资源”，可能会被笑话“老古董”。

4.3 心为物役：良知壅塞的三种机制

结构不会自己传导，传导的是人。人为什么会在一个位置上做出系统性的传导而不自知？中华文明的回答比“结构决定论”更深一层：人有一个本自具足的判断能力，但这个能力会被壅塞。 “壅塞”不是“你没有这个能力”，是“你有，但它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透不出来”。

利益遮蔽：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是知道对你没好处。老师知道留出追问时间对学生好，但这样做考核会难看；学者知道从本土经验生长理论对文明好，但这样做职称会难看。利益不是让你变坏，是让你“看见了也当作没看见”。

信息过载：不是不知道，是太多东西让你来不及想。当信息多到一定程度，人就会抓现成的：现成的观点、现成的立场、现成的尺子。信息过载不是让你无知，是让你“来不及有知”。信息过载对应认知负荷理论——Sweller（1988）的认知负荷理论指出，当问题解决所需的信息处理量超过工作记忆容量时，学习与判断质量下降[23]；Baddeley（1992）的工作记忆模型进一步说明，中央执行系统的容量限制是认知负荷的底层机制[24]。

从众压力：不是不知道，是大家都这样，你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从众压力不是让你变笨，是让你“不敢不笨”——因为不笨的成本太高。

这三种机制对应三种“心为物役”：心被利益役、心被信息役、心被他人役。为什么“心为物役”比“异化”（Marx）或“符号暴力”（Bourdieu）更适合描述中国语境中的传导体验？ 因为“异化”预设了一个可以被完全消除的外部结构，“符号暴力”预设了一个被暴力支配的被动主体；“心为物役”不预设这两者——它把问题定位在主宰能力的持续养护上。壅塞可以疏通，良知可以重新透气。这个命名把指控变成了可修的东西。

与心理学的对话：利益遮蔽与 Bandura 的“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有结构上的相似性——两者都涉及个体对不道德行为的认知回避，但“道德推脱”侧重认知重构（个体通过重新解释行为、分散责任、贬低受害者等方式使不道德行为在心理上变得可接受）[22]，“利益遮蔽”侧重动机性回避（利益使个体“看见了也当作没看见”）。 信息过载对应认知负荷理论[23][24]；从众压力对应 Asch 的经典从众实验——个体在群体压力下会否认自己的知觉判断[25]。Asch 的经典实验表明，个体在群体一致压力下会否认自己的知觉判断——

但实验条件是明确的知觉任务，推广到复杂认知判断时须谨慎。 本文的增量在于把这三种机制整合为“良知壅塞”的统一框架，并给出工夫论的疏通方向。

4.4 反身性声明

本文作者也处于学术生产链条中。本文使用“结构性传导”这个概念来分析教育者的位置，但“结构性传导”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是也是从某个学术传统里拿来的尺子？如果是，用它来分析教育者，和工程师用停留时长来定义工作，在结构上有没有相似之处？有可能。而且很可能。本文的处理方式不是否认，是把这个问题显白地说出来——连作者也不敢站在外面说话。

五、课堂作为认知形成的关键场域：时间不对称性与供给追问终点

5.1 时间不对称性的论证

为什么课堂是核心阵地，而非诸多阵地之一？答案不在于课堂是唯一的地方，而在于它是还来得及的地方。

论证不依赖任何特定的发展心理学理论。只依赖一个一般认识论事实：认知框架一旦形成，倾向于自我确证——SPOT 效应表明，人们即使只是名义上“拥有”某个理论，也会自发地偏好该理论并认为其为真[2]。须显白说明限度：SPOT 效应是实验室条件下的认知偏差，推广到社会层面的“认知框架自我确证”时，须承认实验条件与真实信息生态之间的差异。但即使在这个限度内，“早期形成的框架影响后续框架的建构，反之则弱”这一命题仍然成立——因为它不要求“关键期”的强假设，只要求“路径依赖”的弱假设。

课堂的特殊性：尺子还没定型时供给尺子的地方。一个人在课堂上形成的“什么算问题”“什么算答案”“什么值得问”“什么不值得问”的习惯，会成为他后来面对所有信息时的默认设置。认知战在别处做的事，是利用已经形成的框架；在课堂上做的事，是参与形成那个框架。前者是撬门，后者是配钥匙。配钥匙的人不需要撬门，他有钥匙。

官方话语中的“拔节孕穗期”[26]和“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27]分别指向时间窗口与窗口的公共属性，与本文的论证方向一致。

5.2 三个案例的框架分析

三个案例的选择标准是：官方已公开定性、可完整引用权威文献、且分别展示认知战在教育中运作的不同层面（教材供给常识、试卷倒置情感位置、系统性供给追问终点）。三个案例不能代表全部，但能展示语法的可辨识性。

教材插图事件（2022）：教育部通报将问题定性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层面的“缺乏文化自信的根子问题”[28]。教材的认知功能不是告诉学生“这个对那个错”，是供给一套“不言自明”的常识：什么算正常家庭、什么算正常关系。学生对“正常”默认越深，追问“为什么这是正常”的可能性就越小。为什么“默认”能生效？ 因为学生在长期的课堂训练中已经习惯了“教材说的就是对的”——不是被强迫相信，是教材从来不需要证明自己。

《杜鹃花落》试卷事件（2024）：新都发布通报相关教研员被停职[29]；汤阴县教育局通报该文作者被免职[30]。这篇材料没有否认侵略事实，它做的是另一件事：把侵略者放在“受害者”的情感位置上。学生答事实题可以全对，但阅读时被引导着对一个“失去亲人的老人”产生同情，而这个“老人”在叙事中被剥离了侵略者身份。这就是叙事框架倒置：不改变事实，改变事实被感受的框架。 为什么这种框架能生效？因为学生在长期的阅读训练中形成了“找作者想说什么”的习惯，而不是“检验这个说法站在谁的位置上”的习惯。

台湾地区“识读中国”教材（2025）：国台办新闻发布会确认台湾教育部门完成 13 篇“识读中国威胁”补充教材，于 2025 年 9 月推行[31]；《联合报》社论指出该教材系赖清德授意，并批评其“恐怕是‘违宪逾法’的负面示范”[32]。此案例的作用是反向证明：课堂可以被系统性地用于生产敌对性认知框架，而且以“素养”“反认知战”为名。

三个案例的共同语法：不是改变事实，是改变事实被感受的框架；不是禁止追问，是供给追问的终点。 三者都不禁止学生提问，它们只是让学生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有人答过了”。

5.3 蒙以养正：教育本体论的重构

《周易·蒙卦》说“蒙以养正，圣功也”[33]。这句话不是“教小孩正确的知识”，是在气质还没定型的时候，养那个“正” 。“正”不是一套正确的内容，是知是知非的能力。

“养正”不是“灌正确的内容”。 一个被灌了一脑子正确结论、但从来没被允许追问“我为什么这样想”的学生，在认知主权的意义上仍然是难民。养正的反面不是“养邪”——教错内容可以纠正，养成了不追问的习惯很难改。为什么？因为“不追问”是元认知层面的习惯，而“学错内容”是对象层面的知识。对象知识可以被新信息覆盖，元认知习惯（如何对待知识、是否追问知识的条件）一旦形成，会成为处理所有新信息的默认框架。这就是为什么“养正”比“灌正确内容”更根本。

判断一种教育是否在培育认知主权，标准不是“教了什么内容”，是“是否在教的过程中保留学生对自己如何被塑造的反身意识”。

5.4 内部条件分析

为什么这些案例中的框架能够生效？三个内部条件：学生的阅读训练习惯（“找作者意图”而非“检验叙事立场”）、教材的“不需证明自己”的权威地位、青少年对“威胁”的敏感（这个年龄段正在形成“我们/他们”的边界）。这三个条件没有一个是认知战制造的，它们各有各的教育内部根源。

六、结构性背叛与道统之辨：忠诚对象的语法化

6.1 传统“汉奸”范畴的失效条件

传统“汉奸”范畴有三个预设：边界清楚（谁是里面谁是外面）、有意识（你知道你在背叛）、可识别（能指出具体的人）。在认知战条件下，三个预设都松动了。边界是语法层面的——一个人可以站在“里面”爱国，但他用的范畴框架可能恰在削弱共同体的自我理解能力。意识不再是必要条件——最有效的传导不

需要传导者知道自己在传导。可识别性消失了——背叛弥散在结构里，你抓不到一个具体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只做了一点点。

最有效的背叛，往往不是投靠敌人，是让你失去识别敌人在哪里的能力。

6.2 “结构性背叛”的定义与学术定位

当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其理性选择会系统性地削弱共同体自我理解的能力，而他自己对此毫无察觉，他就处在一个“结构性背叛”的位置上。

与 Benda（2017）“知识人的背叛”[18]、Said（1994）“知识分子的流亡”[19]的区分：后者预设了“有意识选择”——知识分子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选择了背叛。本文的“结构性背叛”不要求主观故意。

与 Young“结构性不义”[7]的对话：Young 的核心命题是“结构性不义不要求主观故意，但要求集体责任”。“结构性背叛”共享“不要求主观故意”的立场，但增加了“良知内在判准”——这是一个只有自己能检验、但可以被反身性追问的维度。Young 停留在公共责任层面，本文增加了一个心性论的自我检验层面。

为什么叫“背叛”而不是“失误”？ “失误”预设了一个可以被修正的错误，“背叛”指向的是一个结构性的位置——你的理性选择持续地、系统性地产生这个后果，不是一次失误，是一种结构。但“背叛”在这里不带有道德谴责的意味——它说的是位置的结构性后果，不是人的品格。

6.3 三重判准的结构

功能判准：该理论/实践在认知生态中的功能——扩展还是取消共同体自我理解的条件？一个学者可以用最西方的术语做最接中国问题的工作，也可以满口传统术语做最不接中国问题的工作。判准不是用不用西学，是功能。

道统判准：是否参与“道”的追问与传承。韩愈在《原道》里建立了一个“道统”的谱系——从尧舜到孔孟，一代一代传下来[34]。本文使用的“道统”概念取的是韩愈的谱系性与朱熹的传心性的综合——不是当代新儒家“开出”的版

本。 选择这个版本的理由：韩愈和朱熹的版本更强调“追问的脉络”而非“体系的建构”，与本文“接道统是参与追问而非守住答案”的界定更匹配。“接道统”不是背古书，是参与中国人自己根本问题的追问。

良知内在判准：良知在此事上是否被遮蔽。这个判准只有你自己能检验。从根本上取消了以“汉奸”标签进行人格审判的合法性，但不取消对行为结构性后果的公共批评。 别人可以指出你行为的后果，但“你是不是在背叛”，最终只有你自己能在心上回答。

三重判准的关系：功能判准是公共可争论的（你说扩展了，我说取消了，可以争），道统判准是公共可辨识的（你接不接道统，可以被讨论），良知内在判准是私人的但可被反身性检验的（只有你能检验自己的良知，但你可以被邀请去检验）。

6.4 忠诚的语法化与责任归属

当“背叛”被重新定义，“忠诚”也需要被重新定义。忠诚的对象不再是一个可以被直观保卫的东西，而是一套使共同体得以自我理解的认知语法。忠诚于语法，不等于忠诚于任何特定的语法内容。 它意味着保护“道”得以被追问、被体认、被传承的条件，而非保护任何一套被给定的答案。

关键区分：保护“追问的能力” vs 保护“让我安心的答案”。 前者是道统意义上的忠诚——你保护的是那个脉络，让下一代人还能问“中国人应该如何生活”。后者可能只是另一种“心为物役”——你保护的不是道统，是一套让你自己安心的答案。最不忠诚的行为，往往是以“忠诚”的名义做的。

责任归属：引入 Young 的“社会连接责任”模型[7]——不是追究个人罪责，而是要求所有参与结构的人共同承担改变结构的责任。这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罪”，是说“每个人都在结构中，都可以在有限的空间里做点什么”。

七、自作主宰：AI 时代认知自主的工夫论框架

7.1 从分析到建构的方法论过渡

前六章是“分析”——认知战如何运作、谁在维持、课堂为何关键、背叛换了什么形态。本章是“建构”——应该怎么做。

从“是”到“应当”的过渡，在学术论文中需要显白的方法论说明。本文不回避休谟问题，但也不试图从事实中逻辑推出规范。 本文的规范性立场是“基于文明传统的可辩护性”——中华工夫论传统提供了一套关于“人如何不被外物役”的实践智慧，这套智慧在 AI 时代具有可辩护性，但不是普遍必然的。它的有效性依赖于一个前提：你愿意接受“主宰能力需要养护”这个中华文明的核心判断。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前提，本文的工夫论框架对你无效——但本文不主张你必须接受它。

7.2 认知主权≠封闭

很多人听到“认知主权”，第一反应是“关上大门”。这不是主权，是另一种被外部定义。你关上大门，全部注意力都在门上；你拒绝外来范畴，拒绝本身用的还是“外来/本土”这个二元对立——而这个二元对立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范畴。

一个真正有主权的人，是能够以自身目的使用、改造和拒绝外来范畴的人。 中华文明最擅长的事恰恰是这个：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不是守住“华夏主权”拒绝它，是用数百年消化它，生成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用的很多概念——理、气、心、性——都有佛教的痕迹，但它们是被消化过的，是服务于中国自己的问题的。消化不等于照搬，也不等于拒绝。

“自作主宰”这四个字，不是阳明原文的固定短语——它更接近后人对阳明“身之主宰便是心”（《传习录》上卷）[17]及“致良知”工夫的概括。主宰不是从外面获得的，是本自具足却被放失的。不是“控制一切”，是“不被一切控制”。

7.3 AI 时代为什么“不假外求”成了结构性必需

以前信息少，你可以靠“知道得多”来有判断力。现在信息无穷多，AI 可以生成任何东西。你不可能靠“知道得多”来有判断力了，因为你知道得再多也多不过机器。当外部信息不可穷尽、不可验证、不可信任的时候——这在 AI 时

代日益普遍，因为验证成本已超过个体的处理能力——唯一可靠的坐标，是一个不依赖信息量的内在判断力。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老话：“心即理”“致良知”“求放心”——答案不在外面，在把放出去的心收回来。你被一个视频气得不行的时候，不是“知道得不够”，是被带走了。把你带走的不是信息，是你的心放出去了。

7.4 五条工夫的工夫论框架

五条工夫不是五个并列的选项，是一条链：知止是“停”——省察是“看”——求放心是“收”——事上磨练是“练”——养浩然之气是“养”。

知止（《大学》）[15]：在信息流里练“停”。不是不看，是看见自己在看。你刷手机的时候突然“醒”一下——你知道你在刷，你知道你在看什么。那个“醒”的一下，就是知止。做对了的标志：你能在刷手机的中途突然“醒”一下，看见自己已经刷了半小时。

省察（朱熹）[16]：每天挑一个念头，问它从哪来。不是否定它，是看见它的来路。你突然很生气——那个“生气”是从哪来的？是你自己的判断，还是别人告诉你“这件事应该生气”？做对了的标志：你对自己的某个反应不再觉得“理所当然”，开始觉得“咦，我为什么会这样反应？”

求放心（孟子）[15]：当你发现自己被某个信息、某个情绪、某个立场裹挟的时候，把心收回来。不是压抑情绪，是把主宰权从对象那里拿回来。做对了的标志：你能在生气的时候，同时知道“我在生气”。

事上磨练（王阳明）[17]：不在静坐里求定，在具体的事里练——工作、对话、吵架、刷手机。你开会的时候，有人在说一个你不同意的观点——你听见心里“组织反驳”的声音。你听见了，但你不一定要跟着那个声音走。做对了的标志：你在具体的事里，比上一次少被带走一点。

养浩然之气（孟子）[15]：通过持续的、有方向的做（不是信息的积累），养出一种不被信息量动摇的定力。你每天做一件你觉得对的事，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不管有没有回报。做对了的标志：你做一件对的事，不需要有人看见，你仍然做

——那个“仍然做”，就是气在养。

工夫效验的可检验性限度：工夫的效验是内在的、长期的、第一人称的，不能被第三人称的经验研究直接检验。但可以通过现象学描述、第一人称报告、长期追踪等方式被间接研究。这个限度须显白说明，而非回避。 工夫论不是经验科学，它不承诺“做了一定有效”，它只承诺“不做一定没有”。

7.5 物质基础与工夫的关系

谁在生产范畴、谁在分配注意力、谁在设定评价参数——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不改，工夫的空间就有限。一个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人，你让他“省察”，他的省察可能只能从“我为什么这么累”开始——这仍然是省察，只是起点不同。

物质条件是弱必要条件——限定了工夫的可能空间，但不决定工夫的具体形态；工夫在物质条件的限制中仍有选择余地。这不是说“等物质条件好了再做工夫”，是说“工夫要在物质条件的限制里做”——你能做多少做多少，不是等条件完美了才开始。

但物质条件的改善不是充分条件。制度改了，心为物役的风险还在——因为它是存在性的，不是历史性的。工夫不是代替斗争，是让斗争不被物役吞掉。 一个心为物役的人，就算推翻了外部敌人，也会在新的结构里被新的“物”役。你不是先改变世界再改变自己；你是在改变世界的同时改变自己。

八、讨论与结论

8.1 理论贡献

在四个概念中，“结构性传导”是本文最核心的理论贡献——它为“无人负责的系统性后果”提供了一个可定位、可归因的分析框架。其余三个概念（认知难民状态、结构性背叛、自作主宰）分别描述这一框架的输入、输出与规范性回应。

概念贡献：“认知难民状态”的四维操作化定义，使“殖民无意识”从修辞概念变为可分析的理论概念。

机制贡献：“结构性传导”的类型学与“心为物役”的心性论重构，使“指标非预期后果”从描述性命题变为可定位、可归因的分析框架。

制度贡献：课堂的时间不可逆性论证——不依赖发展心理学阶段论，只依赖“框架自我确证”的弱命题。

规范贡献：“结构性背叛”的三重判准与“忠诚”的语法化定义，使“无主观故意的结构性后果”从描述性概念变为可操作的规范性判断框架。

建构贡献：中华工夫论作为 AI 时代认知自主的可执行框架——五条工夫构成从“停”到“养”的完整链条。

8.2 “概念工具”的自我检验

每个核心概念能否被后续研究使用、用错、发现用错？

认知难民状态：使用指南——当研究者发现一个群体使用外源范畴组织经验、且对此毫无察觉、且从中获得激励、且抵抗工具被捕获时，可判断为认知难民状态。可能的误用：把“使用外来范畴”等同于“认知难民”。检查方法：对目标群体进行话语分析——他们用来组织经验的核心二元对立是什么？这些对立是否在他们自己的话语生产中被创造，还是从外部输入？如果无法找到“内化不可见性”（D2）的证据，则该群体不处于认知难民状态。

结构性传导：使用指南——当研究者发现一个位置上的人，其理性选择系统性地产生某种认知后果、且此人无主观恶意时，可判断为传导位置。可能的误用：把“所有职业”都标定为传导位置。检查方法：对目标位置进行制度分析——该位置的考核指标是什么？不追指标的人会怎样？如果无法找到“不这样做会被淘汰”的具体机制，则该位置不构成结构性传导。

结构性背叛：使用指南——当研究者发现一个人的行为在功能上削弱了共同体自我理解的能力、且他对此无察觉时，可描述为“处于结构性背叛的位置”。注意：这是描述，不是判决。　可能的误用：把它当作道德标签去指控别人。检查方法：追问使用者是否同时使用了良知内在判准——如果只用了功能判准去指控别人，就是误用。正确的使用方式是：描述某人“处于结构性背叛的位置”，

同时承认“他是否在背叛”最终只有他自己能在心上回答。

自作主宰：使用指南——当研究者发现一个人能够以自身目的使用、改造和拒绝外来范畴时，可描述为“自作主宰的状态”。可能的误用：把它等同于“拒绝外来”。检查方法：检查此人是否能够消化外来范畴而非仅仅拒绝——如果只是拒绝，不是自作主宰，是被“反对外来”这件事定义了。

8.3 实践意涵

教育政策：阅读教育从“理解作者意图”扩展到“检验叙事立场”；评价体系为“提出好问题”保留空间，而非仅奖励“给出正确答案”。

学术评价：为“接道统”的工作保留空间——不是用“国际发表”作为唯一标准，而是追问“这个工作是否在回答中国人自己的根本问题”。

个体实践：五条工夫作为日常认知自主的可执行动作。

8.4 反身性检验

本文使用的“殖民”“主权”“结构性传导”“道术为天下裂”等范畴本身也须接受同一种检验。本文以“道术为天下裂”替代“殖民”作为总纲，但这个替代本身是否也可能是一种浪漫化？有可能。本文的处理方式是：把“裂”当作存在本身的历史形态，而非从某个纯粹状态坠落；问题不是“回到未裂”，而是在裂中是否还有“合”的工夫。

本文的写作本身是否也在“供给追问终点”？有可能。本文的处理方式是：在每个核心概念的定义之后，显白说明其可能的误用与发现误用的方式；在第八章 8.2 节接受“概念工具”的自我检验。本文不敢说完全做到了“保留追问空间”，但本文显白地邀请读者检验。

8.5 研究限度

本文不提供经验因果证明，只提供概念框架与可检验命题。工夫的效验是内在的、长期的、第一人称的，不能被第三人称的经验研究直接检验。三个案例不

能代表全部，但能展示语法的可辨识性。“认知难民状态”的四维定义是操作化的起点，不是终点——后续研究可以修正、细化、甚至反驳这四个维度。

8.6 结论

认知主权不是一次性获得的状态，是持续的反身性实践。本文的核心指向不是“揪出汉奸”，是使难民状态成为可被看见、因而不再能被安然居住的东西。

可带走的问题:在我下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我能看见它,而不被它带走吗？

附录：核心概念对照表

概念	日常语言表述	学术定义	可能的误用
认知难民状态	用别人的尺子量东西，还以为是自己量的	范畴外源、内化不可见、激励中介、抵抗无坐标的四维认知困境	把“使用外来范畴”等同于“认知难民”
结构性传导	好人在一个位置上，不知不觉成了系统的一部分	位置使理性选择产生系统性认知后果，无需主观恶意	把所有职业都标定为传导位置
心为物役	心被外物牵着走，自己做不了主	良知被利益遮蔽、信息过载、从众压力三重壅塞	把“心为物役”当作道德谴责而非工夫问题
结构性背叛	好人在一个位置上，不知不觉削弱了共同体理解自己的能力	位置使理性选择产生系统性认知后果，无需主观故意；三重判准：功能、道统、良知内在	把它当作道德标签去指控别人
道统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的追问脉络	“道”得以被追问、被体认、被传承的条件	把“道统”等同于“固定答案”
自作主宰	不是控制一切，是不被一切控制	以自身目的使用、改造和拒绝外来范畴的能力	把它等同于“拒绝外来”
蒙以养正	在还没定型的时候，养那个“知道对错”的能力	在气质未定型时养其知是知非的能力，非填充范畴	把“养正”等同于“灌正确内容”

参考文献

[1]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第二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R/OL].

(2025-04)[2026-10-29]. 转引自中国新闻网, 2025-04-24.

[2] GREGG A P, MAHADEVAN N, SEDIKIDES C. The SPOT effect: People spontaneously prefer their own theori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017, 70(6): 996-1010. DOI: 10.1080/17470218.2015.1099162.

[3] JIN E, JIANG X. How bibliometric evaluation makes the academia an 'Iron Cage': Evidence from Chinese academics[J]. Research Evaluation, 2024, 33: rvae031. DOI: 10.1093/reseval/rvae031.

[4] 曾华锋, 石海明. 制脑权：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战略[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4.

[5] NATO Innovation Hub. Cognitive Warfare Roadmap[R/OL]. ACT-sponsored study, 2020. https://innovationhub-act.org/wp-content/uploads/2023/12/20210113_CW-Final-v2-.pdf. [2026-10-29].

[6] NIELSEN R K. Echo chambers, filter bubbles, and polaris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R].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2022.

[7] YOUNG I M. Responsibility for Justi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3-74, 95-122.

[8] MIGNOLO W D. 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Global Futures, Decolonial Option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4.

[9] RABET P. Safe-Haven Ignorance: The Epistemic Refugee[J]. PSU McNair Scholars Online Journal, 2025, 17(1): Article 4. DOI: 10.15760/mcnair.2025.17.1.4.

[10] 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M]. Translated by NICE 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2-65.

[11] 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5-37.

[12] MULLER J Z. The Tyranny of Metric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167-173.

[13] STRATHERN M. 'Improving ratings': audit in the British University system[J]. European Review, 1997, 5(3): 305-321.

[14] CAMPBELL D T.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lanned social change[J].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1979, 2(1): 67-90.

[1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 14, 231-232, 335.（《大学章句》“知止而后有定”句；《中庸章句序》；《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章；《孟子·告子上》“求其放心”句）

[16] 黎靖德, 编. 朱子语类：卷九[M].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7]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M]. 吴光, 钱明, 董平, 等编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3.（《传习录》上卷“人须在事上磨”条）

[18] BENDA J. 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M]. Translated by ALDINGTON R.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KIMBALL R. London: Routledge, 2017.

[19] SAID E W.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20]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王孝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1069.

[21] 杨国荣. 从道术之裂回归统一形态——《庄子·天下》的深层内涵[J]. 哲学研究, 2025(9): 74-84+175-176.

[22] BANDURA A.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999, 3(3): 193-209.

[23] SWELLER J. Cognitive load during problem solving: Effects on learning[J]. Cognitive Science, 1988, 12(2): 257-285. DOI: 10.1207/S15516709COG1202_4.

[24] BADDELEY A. Working memory[J]. Science, 1992, 255(5044): 556-559. DOI: 10.1126/science.1736359.

[25] ASCH S E. 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J].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1956, 70(9): 1-70.

[26] 习近平.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9-03-18)[2026-10-29]. 转引自中国文明网《同学你早》第248期.

[27] 郑富芝. 尺寸教材 悠悠国事——全面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N]. 光明日报, 2020-01-21(13).

[28] 教育部. 关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的调查处理通报[R]. 北京: 教育部, 2022-08-22.

[29] 新都发布. 关于新都区初三年级语文测试阅读材料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通报[EB/OL]. (2024-03-25)[2026-10-29].

[30] 汤阴县教育局. 关于对李某某发表小小说《杜鹃花落》的处理通告[EB/OL]. (2024-03-26)[2026-10-29].

[31]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台办：“台独”教材必遭反对和唾弃[EB/OL]. (2025-07-30)[2026-10-29]. https://www.gwytb.gov.cn/xwdt/xwfb/wyly/202507/t20250730_12715105.htm.

[32] 联合报. 社论[N]. 联合报, 2025-07-15.

[33] 黄寿祺, 张善文. 周易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43-50.

[34] 韩愈. 原道[M]//马其昶, 校注.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4.